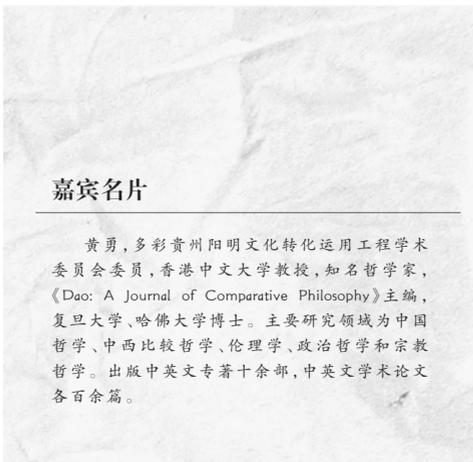


【关注本土文化】



嘉宾名片

黄勇,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知名哲学家,《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主编,复旦大学、哈佛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出版中英文专著十余部,中英文学术论文各百余篇。



搭建中西方哲学沟通交流桥梁

——访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勇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文 覃伟/图

受聘为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勇开启了第一次贵州之行。“中国心学与世界”中德哲学对话在贵阳孔学堂举行期间,他先是在开幕式上作《王阳明对恶人的反感》主旨演讲,后在中德学者的对话活动中,围绕“当代道德心理学中的人我合一与宋明理学的‘万物一体’”共情是利己还是利他?的主题展开学术对话,继而作为“文润黔山——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名家讲座”第四期主讲嘉宾,开讲《万物一体与同感:王阳明对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贡献》。通过三场活动,黄勇教授完整揭示了心学智慧如何超越五百年时空,为现代道德困境提供哲学根基;“同感”理论何以成为连接个体良知与人类命运的桥梁,在全球化时代重释“天下大同”的文明价值。

■从比较语言到比较哲学、比较人文学

记者:您在讲座中有一个细节:PPT为英文,演讲用中文。您在中英文哲学语境中的自如切换,让人联想您此前介绍歌德的“比较语言学”观点:“如果你不懂外语,那么你对自己的语言一无所知。”结合您从事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以及您面向未来的人文学术提出的“比较人文学”概念,可否这样理解您的学术路径:从比较语言的视角出发,拓展到比较哲学,再拓展到“比较人文学”?

黄勇:是的。当然我目前还未达到自己理想中的程度。你刚才的话给了我启发。就像歌德说的,若不懂外语,连自己的语言也一无所知。当然,他并非指荷马因只懂希腊文却不懂其他语言而对希腊文也一无所知。他的意思是,若只懂希腊文却不懂其他语言,便无法真正了解希腊文作为语言的意义。我想进一步拓展这一思考,提出一个哲学问题:若只知道一种哲学传统却对其他哲学传统一无所知,是否可以说不哲学也一无所知?若只知道孔孟老庄,而不知道任何其他哲学,是否便对孔孟老庄的思想也一无所知?也不尽然。这里指的是必须了解其他哲学,才能全面理解作为哲学的孔孟老庄的思想。

能,在其他传统中已经有了;另一方面,只在自己的传统里很难做出创新,只有在不同传统对话的过程中,才能有创新。我目前主要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过程中提出一些新想法,这些新想法不一定完全是我自己的。例如我提到的王阳明“对恶人的反感”,对西方人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并非我的创造,而是王阳明的理论。此外,我尚未涉及的另一面是,比较人文学,即若仅知哲学,而不知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等其他领域,则对所学的“哲学”也一无所知。人文领域中,我们应了解历史、文学等领域,以更好地理解哲学。比如有些哲学问题的讨论必须与心理学相结合,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

记者:具体到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上,您已做了很多工作。创办的比较哲学类期刊《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组织的“相遇中国哲学”系列活动等,为中西比较哲学研究搭建了重要的学术平台。请问在推进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层面,您过去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未来有何学术规划?

黄勇:先说我的英文刊物《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与《中国哲学杂志》《东西方哲学》等其他同类的英文刊物相比,我们这个刊物只有20多年,历史还较短,但我们的刊物成长较快。如今,影响力是评价刊物的重要标准,而在所有同类刊物的影响力因子评比中,我们的影响力一直是最高。从一开始,我就设想将《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设定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桥梁。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本身存在差异,但我想将中国哲学家的研究成果与西方哲学家、特别是那些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联系起来。因为中国哲学家在中文环境中进行研究时,通常很少关注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西方哲学家用英文从事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时,几乎从不引用中国哲学家用中文写的成果。我想通过这本刊物改善这一现状,因此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每期都有书评,关于中国哲学的英文书、中文书各三本;二是增加综述文章,即根据具体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将汉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写成英文综述刊发出来,向国际学界推介。这不仅是将中国哲学介绍给世界,更是要将中国哲学家的研究与世界建立联系。我还编了两套书。在英语世界,很多出版社都喜欢出版所谓的“companions”系列,这些书非常详细,比如专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物理学等。“companions”系列

几百本里,可能只有一本是中国哲学的介绍,中国哲学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比较弱。我说服了出版社编辑,于是编了《Dao Companions to Chinese Philosophy》,这套书编得较早,规模也较大,现在已经出了20本,全是英文,以后计划出超过100本。另一套是《Fudan Studies in Encountering Chinese Philosophy》,每本选择一位有名的当代西方哲学家,他可能对对中国哲学一无所知,但在这个领域里被公认为是重要的哲学家,有十几位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对这个西方哲学家提出挑战,再由他作出回应。这套书是我最想编的比较哲学著作,现在只出了两本,第三本快要编辑完成。

■越是特色越是要全球化

记者:比较哲学的工作角度体现了“全球化”学术取向,当下还有另外一种学术取向,即“区域化”,走向地方和民间。对此,您如何看待?

黄勇:我觉得“区域性”和“全球性”实际上是一致的。原来“区域性”在英文里面叫作“local”,“全球性”叫作“global”。以往有人以为,“global”和“local”是相互冲突的,实际上,真正“global”的东西,往往是“local”的;真正“local”的东西,是“global”的。例如,在贵阳有个麦当劳饭店,但真正外国人要到贵阳来吃,他不会去麦当劳,他一定要吃贵阳具有特色的菜,越有特色,其他地方的人越要现场体验。所以,现在英文里有一个词叫作“glocal”,即“global”和“local”合在一起的新词,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没有冲突。同理应用在“中国心学”这个词上,就像“心学”是中国的,阳明学又非常独具贵州特色。你越是特色,人家越是要了解,因而也就越具有全球性。

记者:您提到“阳明学又非常独具贵州特色”。作为阳明心学诞生地,贵州正在大力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对此您有什么好想法或者建议吗?

黄勇:我是做中西比较哲学的,做得比较多的是怎么把阳明思想跟世界上其他的哲学传统或者文化传统做对话。中德哲学对话有很长的历史,今年第一次在贵阳举行,请了七八位德国的哲学家过来。“中国心学与世界”是这次活动的“大标题”,中德哲学对话是这次活动的“小标题”。我们可以在“中国心学与世界”这一“大标题”下规划中美哲学对话、中印哲学对话、中日哲学对话、中韩哲学对话等“小标题”。按照这个规划,可以出一套《中国心学与世界》系列书。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非常有价值的,真正把中国心学(主要是阳明学)跟世界连在一起。记者:目前贵州在推动阳明文化的国际化诠释、国际传播和对

话。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受众,您认为如何进一步增强阳明心学的吸引力和接受度?

黄勇:我是做哲学的,从学术角度比较强调的是研究,没有强调太多的传播。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又不冲突。跨文化研究过程中,传播是重要方式。通过研究来传播,实际上能更好地传播。若只是简单传播,对方可能不理解。因此,通过研究过程更能有效传播。记者:想到您的一个观点,即您不追求建立一个自己的哲学体系,喜欢做的是一个具体的哲学问题,特别是中国哲学家或哲学文本可以对此做出独特贡献的哲学问题。您自己有阳明文化的研究计划吗?

黄勇:我筹备了很久,在写一本关于王阳明的英文书。书里的每一章,都突出当代哲学中讨论的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我选择的问题并不是对王阳明思想的全面研究,但我选的每个问题都是当代西方哲学里争论比较多的。而且,我选择的每个问题,都觉得当代西方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尽管各不相同,在我看来都有缺陷。而王阳明理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能做出独特的贡献。

当然,我并不是说王阳明思想在任何哲学问题上都是最好的,西方哲学家在有些问题上讨论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的书主要是用英文写给英语世界的读者看,因为英语世界里知道王阳明的还不多。但我不是让他们知道王阳明思想,而是通过王阳明的视角参与讨论他们感兴趣的哲学问题,并由此让他们在王阳明思想中得益。

记者:您对当代青年学者的治学方法有何建议?

黄勇:在哲学领域,中国哲学传统中有很多丰富资源,对解决当代问题能做出独特贡献。但我认为青年学者不应总想着打破西方话语权,不同文化传统实际上是平等的。

我写的每篇文章几乎都涉及中国哲学,并论证中国哲学在我所讨论的哲学问题上比西方哲学家更有道理的观点。实际上我在研究过程中,最近几十年主要写中国相关内容,在写作过程中也会参考西方哲学中的相关知识,并从中学到了很多。

年轻学者若以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为研究基础,一方面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资源丰富;另一方面要保持开放态度,汲取其他传统的优点。只有在两种传统对话、交锋的过程中,才能碰撞出不同文化传统中都没有的新思想。我们追求的是真理,真理若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弘扬之;若在西方文化中,也弘扬之。或许真理既不在中国文化,也不在西方文化,需通过比较发现。因此,我们的定位是追求真理。在哲学问题上,我们要找到最合理的解决方案,不论其来自哪个哲学传统。

【评弹】

电影《戏台》的言外之意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电影《戏台》公映,让消失于银幕多年的陈佩斯,再次通过影院与大家见面,让一种属于“老派”的电影创作手法,为观众所重温。从开始不被看好,到口碑暗流涌动,再到体现出有力的票房后劲,《戏台》不只是一部电影,它与过去几十年的娱乐记忆有关,更与电影艺术的创新与守正有关。

在整个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初期,陈佩斯因主演电影《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爷儿俩开饭馆》,以及小品《吃面条》《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等,在喜剧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周星驰、赵本山、冯小刚在他之后才相继各领风骚,要论“喜剧之王”,陈佩斯应排名在前。这段前史,也与《戏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戏台》本身以及电影的言外之意,也暗合陈佩斯的人生与艺术轨迹。

陈佩斯在鼎盛时期隐退,传闻中的原因是否属实已不重要。他的“不配合”,后来也引来两种解读:一种是他重视个人权益与尊严,是真正的艺术家;另一种是他个性太强,因小失大,没有必要。在漫长的时间洗礼下,陈佩斯“宁折不弯”的姿态,已经深入人心。他能把这种姿态坚持几十年不变,也算是言出必行、认真到底。在娱乐业纷乱的价值体系中,陈佩斯成为一个行业内少有人企及的标杆。这个背景下,观看《戏台》就具备了以下动机:窥探陈佩斯内心是否依然纯洁如斯;打量《爷儿俩开饭馆》之后陈佩斯的艺术境界进展到了哪一层次;在“投机取巧”为一些影人推崇时,《戏台》要不要妥协……

这么多的期待,意味着陈佩斯新片面对的风险,要多于同档期其他电影。公映后的《戏台》,让人看到创作者的一种诚恳与忠实,尤其是陈佩斯,他的个性没变,价值观没变,艺术审美没变,唯一变的是他从当年银幕、舞台上的那个意气风发青年人,变成了一个沉稳有加、懂得让人出彩的老艺术家——陈佩斯没把自己的角色安排得“伟光正”,是一种奉献,这是一种只属于老艺术家才懂的“让”,他把光环让给了金啸天的饰演者尹正和凤小桐的饰演者余少群,戏里的《霸王别姬》,成为《戏台》的戏剧内核,《霸王别姬》的无奈与悲壮,才是《戏台》想要传递给观众感知的情绪。

功力深厚,传递便真章,《戏台》带有陈佩斯久远之前的创作印痕,也带有超越过去与当下的锐利思考。

《戏台》讲的是民国初年,北平城头变幻大王旗时,一个戏班子的生存遭遇。不管谁进了城,还能耽误演戏、看戏——这一说法,在市井与戏班子里,无论从谁口中说出来,都带着自我安慰的色彩。人心惶



《戏台》宣传海报。

惶之下,戏班子能否将一台戏安稳地唱完,本身就是世道人心最真实的试金石。陈佩斯饰演的侯班主,在姜武饰演的洪大帅进城后,心就已经乱了,为了生存,他的虚与委蛇,让戏班子内部荒唐丛生,黄渤饰演的包子铺跑腿伙计大嗓儿,以一个“闯入者”的身份,见证并参与了这份荒唐。

《戏台》是一部在创意上高明的电影,它叠加了古代、近代与当代,三个时代互为镜像、彼此映衬,探讨的都是“要不要认输,要不要妥协,要不要坚持”的问题。

《戏台》电影结尾时的高潮一幕,可以视为陈佩斯的一次宣告,“人可以死,戏不能改”,观众观影至此,会觉得戏班子的输赢已经不重要——当观众与故事人物站到了一起,电影与观众就实现了“双向奔赴”。

电影《戏台》改编自陈佩斯同名话剧。除《戏台》外,陈佩斯这些年还有《托儿》《阳台》《惊梦》等话剧作品,受版权保护意识强、观众维护观念重等因素影响,这几部口碑很好的话剧,多年上演后主要情节与看点仍有神秘色彩,这给陈佩斯后期继续改编电影带来了利好。有了话剧舞台的成熟打磨,电影《戏台》结构清晰、工整,表达细腻,是一板一眼的认真之作。

《戏台》实现了娱乐性与思考价值并重的效果。电影也明确地提出了问题,给出了答案,且在这一过程里,没有含糊糊糊,如果观众在看《戏台》时感受到一种清新之风,那其实就是故事与观点的魅力和力量。

贵阳籍著名作曲家陈黔:“为擦亮贵阳‘爱乐之城’这张名片作出贡献”



在“大师讲堂”上,老师指导乐团学生演奏。

“小提琴的节奏快一点”“这里是四分之二拍”“这里的节奏要稍微强一些”……近日,记者来到贵州大学音乐学院的演艺厅,看见来自广州市第八十六中学的音乐学生正在聆听泰国音乐交响乐艺术中心音乐总监、指挥、管乐团指导专家苏基特的“大师讲堂”。该活动系2025贵阳秀美花溪·花溪之夏“聂耳”青少年乐团展演艺术周的活动之一。

“大师讲堂”只是艺术周其中的一个环节,每天要举办8场,为青少年音乐爱好者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此外,艺术周还设置了“聂耳”青少年乐团展演、乐团公益音乐会、乐团交流、大师讲座等活动,涵盖音乐会、文化交流、文旅体验等多类型文化活动。”著名作曲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艺术顾问、北京市管乐学会副主任、“聂耳”青少年乐团展演艺术周艺术总监陈黔说,此次艺术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30余支优秀青少年乐团参加,参演人数超2000人。

陈黔1962年出生于贵州贵阳,三岁随父学习小提琴,四岁学习钢琴。1985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同年任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创作室,2007年应聘

为美国范德堡大学布莱尔音乐学院旅美教授,2010年出任WASBE国际音乐节和管乐大赛评委。他创作了大量音乐、管弦乐、影视音乐、舞台音乐和电子音乐等作品。他的大部分管乐作品在美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出版、上演。

谈到为何来贵阳花溪秀美“聂耳”青少年乐团展演艺术周时,陈黔自豪地说:“因为我就是贵阳花溪土生土长的人,想为家乡做些事儿。”陈黔是“聂耳”青少年乐团展演艺术周的策划人,该艺术周已在深圳、昆明等地举办过,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性音乐交流平台。“我们想把这些资源带来贵阳,让贵阳的孩子与国内外乐团交流学习,在开阔眼界的同时,取长补短。”陈黔说,艺术周就是一座交流学习的桥梁,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通过丰富多元、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为贵阳艺术教育发展注入新活力。“近年来,贵阳举办了多场路边音乐会,有着‘爱乐之城’的称呼,相信艺术周的举行能为擦亮贵阳‘爱乐之城’这张名片作出贡献。”陈黔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易颖 文/图